

# 匪緬關係的過去與未來

李柏泉

## 六

緬甸決策人心灰意冷之餘，這才警覺到自己的期望與理想只不過是虛無的空中樓閣，於是他的對外關係開始有了微妙的轉變。他開始嘗試與西方接近的路線，看看是否能藉助外力而減緩來自共匪和內部的雙重壓力。

一九五八年，強人尼溫上台之後，便接受了美國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另外接受了三千七百萬美元的援助，並以低廉的價格自美國輸入對付內亂所急需的大量軍火。甚至更一度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了東南亞公約組織的軍事演習。同時，緬甸政府對內部的緬共武裝力量展開積極地剿擊行動。

緬甸政府這一連串的行動，果然對共匪產生了極強烈的刺激作用，使其不得不重視到緬甸與美國繼續接近之後對其所產生的威脅。加之，一九五九年間，共匪整個對外關係突然陷入一個極其不利的局面。此時，他與印尼之間掀起了嚴重的政治紛爭；而與印度在喜馬拉雅山麓一再爆發的武裝衝突事件，更使其在亞非世界的聲譽蒙受沉重的打擊。隨之，西方國家甚而蘇俄給與印度在物質或精神上的不斷支援，更使共匪感到國際間的一股壓力。對此，他必須設法加以突破。於是，與匪相鄰而實力薄弱充滿矛盾的緬甸很自然地又被選為最佳的目標。

於是，陳毅再度對緬甸發出了攻勢：「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需要一個繼續和緩的國際局勢。……我們需要同所有鄰邦和平共處，在有共同邊界的東南亞國家更需要和平共處。……」（註十）

對緬甸來說那實在是極其苦惱的選擇，他自始便對共匪深具戒心，而對其「和平共處」的誠意也一再有過痛苦的體驗，然而此時却又無法不接受再一次的嚐試。原因之一是他對和平的意願是那樣強烈不願放棄任何機會；其二顯然由於客觀上的種種因素，使他很難擺脫與共匪的交往。

共匪不僅一向防範緬甸投向美國懷抱，此時由於他與蘇俄關係的逐漸開始破裂，於是便在一切國際戰線上與蘇俄展開鉤心鬥角的爭奪戰。當蘇俄宣佈黑魯騰夫將於一九六〇年二月訪問緬甸之後，共匪便積極地搶先於一月間

下。

將尼溫迎接至北平（註十一）。並立即提出希望緬甸繼續執行其「不結盟的和平中立政策」的暗示，以防止他的傾向於美國或蘇俄（註十二）。

自然面對着美國和蘇俄的有力競爭，此次共匪必須付出具體的代價以籠絡對其不再完全信任的緬甸。於是，在尼溫抵達北平之後，匪緬雙方迅速地簽定了「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和「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共匪聲言：雙方第一次使「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用條約形式固定下來了」（註十三）。共匪重申「承認和尊重緬甸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而緬甸也保證「不參加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註十四）。

顯然除了美蘇兩方的威脅之外，由於共匪與印度間因邊界問題的兵戎相見，而促使緬甸在其與共匪的同一紛爭上，獲得意外順利的解決與收穫。因為，共匪此時不獨要換取緬甸不加入東南亞公約組織或與美國間其它形式的軍事結盟的保證；更急於創造一個國際間的「新範例」，以「證明」共匪完全能適過和平協商的辦法而與鄰邦解決邊界問題。同時用以「反證」：何以他與印度之間的同類問題就會掀起戰爭？顯然「難講話的是他」，以圖挽回其在亞非世界一落千丈的聲譽。

緊接着同年十月一日，此項「邊界條約」便在北平簽字。翌年一月四日，即緬甸獨立的第十三周年紀念日，雙方在仰光交換了「邊界條約」的批准書。隨着此一「條約」的簽字，共匪同時更以一筆為數高達三千萬英鎊的十年無息貸款給與緬甸，並聲稱：「不附帶任何條件和特權」，以作為緬甸友誼的贈禮。

除了這三千萬英鎊的龐大貸款不談，緬甸對雙方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自是心滿意足，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這都算是緬甸與共匪交往的十多年中最大的收穫。然而，此一邊界的明確劃定，再加上互不侵犯條約的具體保證，豈果真能解脫了緬甸的苦惱？

## 七

一九六二年，尼溫再度以軍事政變的手法掌握緬甸政權。接着宣佈實施

其所謂「緬甸式的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採取全面的國有化政策，並沒收了所有在緬甸外僑的產業，自然使得華僑的經濟地位陡然間遭受嚴重的打擊，從而與緬甸人之間有了深刻的閼隔。華僑之間這種不滿緬甸政府的情緒，顯然為共匪巧妙地加以掌握。

尼溫歷經數年共黨式的經濟措施，不但未能促使緬甸經濟狀況有所起色，反使情況日趨惡化，例如緬甸素以食米的輸出為對外貿易的大宗，但近年來某些地區竟出現缺糧的情形。此一嚴重的經濟災難，自使本已動蕩不安的國內形勢更加紊亂。於是，各地的少數民族、左翼勢力重新加強了他們的反政府活動，而緬共更是乘機重整旗鼓加緊展開游擊戰鬥。

一九六三年六月，尼溫曾與緬共進行和談，但由於雙方基本上難以協調的矛盾，時至十一月此一和談終未能逃脫破裂的命運。共黨的繼續發動叛亂，使得仰光當局焦頭爛額之外却苦無有效對策。而共匪對緬共的各種策應和聲援從未中斷；一九六四年十月，共匪公然廣播一項慶賀被緬甸政府禁止的緬共十五周年紀念的文章。同年底，緬甸駐北平大使向尼溫報告稱，在北平的一次官方宴會中，緬共領袖竟公然在其面前出現。一九六五年三月共匪更暗中向緬甸散佈一本稱作「告熱愛和平的緬甸人民」的小冊子，文中攻擊尼溫的革命委員會迫害「所有緬甸民主軍隊的合法領袖」。對於一九六三年緬甸政府與緬共和談的流產，這本小冊子除却將責任推給緬甸政府之外，並聲稱：「在緬甸已工作很久的蘇俄政府陰險勢力，試圖在緬甸製造一個聽從莫斯科修正主義份子指揮的傀儡政權」（註十五）。可見共匪與蘇俄間日趨激烈的衝突已深深地捲入共匪對緬甸的鬥爭領域之中。

對於共匪諸如此類公然藐視其與緬甸之間「友好互不侵犯」的誓約，尼溫在形格勢禁之下表面唯有忍氣吞聲。

此時，陷入越戰泥潭的美國，逐漸發覺到緬甸的中立政策對阻止共匪的向南擴張，具有某種價值，雖說這種價值尚賴時間的考驗，但却使美國在外交上改變以往曾給與緬甸的某些「成見」（註十六）。在白宮智囊的建議之下，詹森展開了對緬甸的積極友好攻勢，而緬甸也基於其本身的迫切需要，於是接受了八千二百多萬緬幣的美國援款（註十七）。其間雖經劉少奇親自前往遊說和勸阻並提出：「經濟獨立是維護政治獨立的重要條件」，以恫嚇緬甸可能淪入美國的控制，但緬甸接受美援的決心並未為之動搖。而一九六

緬甸關係的過去與未來

六年間尼溫更毅然接受了詹森的邀請訪問了以往他會有意疏遠的美國。一九六六年間，尼溫除了美國之外，並訪問了日本、英國；一九六七年初更訪問了與美國有緊密軍事聯盟的東鄰泰國。緬甸此一對西方世界的態度逐漸好轉的趨向，自是觸怒了一向視緬甸為其禁脔的共匪。這構成了近年雙方關係日漸惡化的要素之一。

## 八

當一九五四年共匪初向緬甸以及其它東南亞地區發動和平攻勢之時，曾竭力令其駐外人員作出一種誠懇、謙卑、和善的姿態，盡量避免給人一種「大國主義」、「沙文主義」、「強權主義」的印象；同時並一再告誡左傾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不應該參加緬甸的政治活動」同時並向當地政府保證「也不在華僑中發展共產黨」（註十八）。但實際上，歷年來共匪對緬甸的一切活動除却暗中的支援緬共不談，總是有意無意地流露出那種自大、自傲、目空一切的作風。舉例來說，其駐仰光的「大使館」竟擁有職員將近二百人之多，儘管緬甸政府會一再暗示，希望其把人數減低至與其他各國使館人員相等的數目，但共匪始終不與理會。再如共匪在緬甸的一些僑校同樣藐視緬甸政府國有化的命令，始終倔強地我行我素，成為私人學校，並公開在校內宣揚灌輸共產主義思想；而緬甸的親匪華人更成了策應緬共發展的第五縱隊。這些不僅違犯了緬甸政府的法令，同時無形中也觸犯了緬甸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

一九六六年共匪在大陸掀起了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這原本是其內部的「奪權鬥爭」和「思想鬥爭」，但毛澤東一派頑強的狂妄言行，同樣也反映到共匪的對外關係上。並趁機向東南亞地區親共而不滿當地政府的華人傳播「毛澤東思想」。其主要目的無外乎下列數項：（一）對匪區內部藉此以激發並壯大毛派在鬥爭中的聲勢；（二）對外藉此以顯示華人社會對其政權的「擁護」與「效忠」；（三）藉紅衛兵式的狂熱情緒，向海外華人的青年一代中傳播共產主義的思想。但不論其動機為何，目的為何，此種具有強烈政治性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已先後為東南亞各地政府所明令禁止。而緬甸左傾華人在匪駐仰光「大使館」人員的煽動之下，完全無視此一禁令之存在。由於親共學生的一再頑強地違抗緬甸政府禁止他們在校外佩帶毛

澤東徽章的通告，因而爆發了今年六月仰光的「反華排華」大暴動。

此一事件的爆發，因素自然並不單純，除了尼溫意圖藉此以刺激緬甸的民族情感，從而轉移人民對其近年來種種不當的政治、經濟措施的不滿情緒之外，事實上也就是緬甸朝野上下對共匪那種氣勢凌人、口蜜腹劍的「大國沙文主義」行徑，容忍十多年之後的一次總爆發。而共匪連年來對外關係的全面惡化，以及其內部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現的極度混亂局面，則直接鼓勵了尼溫此次對共匪採取強硬行動的勇氣。

## 九

在共匪「內憂外患」陷入空前困境之際，歷來被視為嚴守中立的緬甸對共匪的此一打擊，自是沉重異常，共匪在震驚憤怒之餘，自必採取報復手段。於是：

緬共中央委員會於仰光事件爆發之後立即發表聲明，攻擊「尼溫法西斯」的「反華暴行」，並聲稱此次事件是「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所共同策劃的，同時「號召緬甸人民以武裝鬥爭推翻尼溫政府」。八月十五日，緬甸共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在為紀念緬共成立廿八周年而作的一篇文章中聲言：「緬共今後必須堅持毛澤東「槍桿子裏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加緊推行「革命武裝鬥爭」。同日，中共中央發出祝賀緬共成立廿八周年的電文中則聲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緬甸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鬥爭。我們把這種支持看作是我們應盡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註十九）。

這裏共匪已正式宣佈其而後對緬甸政策的方向。事實上，正是共匪十多年來在緬甸暗中所走的方向，而此次仰光的「反華排華」事件，只不過使共匪「理直氣壯」地提早此一道路的公開化而已。

在此次緬緬關係破裂之前，已有許多西方觀察家根據種種事實而提出警告：未來的緬甸很可能成爲世界上「第二個越南」，如今看來，這種隱憂甚有提早出現的可能。試以下列四點加以分析——

(一)就空間言：緬甸與中國西南地區緊密相連，它可直接威脅到雲南、西藏一帶的安全；基於此，共匪在能力可及的情況下決不允其與西方發生軍事結盟；自然積極地，如果緬甸能夠完全「解放」，則不但解除它可能給與大陸西南地區的潛在威脅，更將成爲共匪向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繼續擴張的前進基地。一個赤化的緬甸，東側可以緩和因泰國與美國的緊密軍事同盟而給

與共匪的強大壓力，向西則可直接策應印度阿薩密地區的反政府組織；連同北面的西藏，西面的西巴基斯坦而對印度構成三面的包圍形勢；而印度自是共匪心目中亞洲最大的目標之一（註二十）。

此外，由緬甸向東伸展，直抵越南的廣大地區，大多爲山巒起伏、叢林密佈、交通不便的地區，顯然是游擊戰爭理想地帶。同時，此一地帶不若印尼與中國大陸之間橫隔着遼闊的海面，共匪可輕易地進行大規模的滲透和支援。同時，緬甸也比不上印度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實力，可以在邊區直接有效地抗拒共匪的活動。再加上目前緬共的活動已達極其嚴重的地步，因之，在空間上，緬甸乃是對共匪最具戰略價值而較易得手的近鄰。

(二)就時間言：目前越戰的拖延不決，對於始終懷抱「有限目標」的美國來說，不論在物質、人員、精神乃至於國際聲望上，俱都是一種龐大的耗損；他已一再表明其「光榮結束」此一戰爭的心願。去年以來，更不斷地透過一切可行的途徑向北越展開和談攻勢。正因爲美國此一厭戰的心理弱點的流露，再加上共匪竭力的阻擾，因而北越始終以頑強的姿態，回答美國和談的提議，甚而揚言不惜要與美國「作戰一千年」。但事實上，北越必然瞭解，在美國逐漸將戰事升高的壓力之下，北越相對地也無法不升高其可怕的代價。而戰爭的拖延不決，唯一坐收漁利者乃是共匪。所以基本上，和談並非完全違反北越的利益。因之，一旦北越基於其本身的利益而與美國「討好價錢」之後，越南之出現和談局面進而產生某種停火協議，並非全無可能。由共黨陣營的發展觀之，共匪實難以長久全面地控制北越。

果真越戰在短期內出現和局，則共匪不但無法繼續其「拖垮」美國的計謀，同時也將使其一再宣揚的「人民戰爭」，失去一個極其有利的實驗場與表演台。因之，爲了防範此一局面的出現，共匪需要在有利的地區開闢另一「越南戰場」，如果美國再度做同樣「有限目標」的涉入，則共匪又將保持其在越南所獲得的同樣利益。基於共黨武裝力量已有的發展和當地可資利用的矛盾，緬甸自是此一戰場的最佳選擇。因而，隨着國際間越戰和談空氣的一再出現，共匪必然加緊其對緬共的支援行動。

(三)共匪本身的主觀因素：共匪自始以推行「世界革命」爲其「國際義務」；並堅持以武裝暴力爲達成此一目標的唯一有效手段。雖然他的此一路線，多年來已在亞非拉各地遭受全面的挫敗，但仍堅不放棄此已爲「蘇修」所放棄的死硬路線，甚而不惜已與蘇俄破裂。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更是共匪此一「武裝革命」理論近年來最具體而明確的

誓言。但是，任何一項理論顯然必須具有實際的證明方能取信於人。因之，他勢必要在越南戰場之外，另行找出一理想地區，以向世人展示其「人民戰爭」的功効。

(四)國際間的客觀因素：目前國際間圍堵與對抗共匪的有效實力，一來自蘇俄，一來自西方國家。蘇俄由於地緣關係，對共匪的壓力，僅限於北方漫長的邊界地區，而無法伸展至南方。至於美國，在越戰中已一再做出「光榮結束」的表示，甚而其太平洋上針對共匪的防線，已有撤退至馬利安娜羣島的傳聞（註廿一）；使人懷疑美國有興趣在東南亞地區再做類似於其在越南的涉入。而英國，已於本年七月十八日正式發表聲明：至一九七〇年中，他將撤退其蘇伊士以東廣大地區的軍事基地（註廿二）。基於以上因素，東南亞地區顯然已有出現防禦力量真空的危機。這對當地政府和人民抗拒外來侵略的信心更不無巨大影響（註廿三）。反之，它對共黨永無止境的擴張野心，却將產生莫大的鼓舞作用。雖然，美國已進行計劃如何接補此一真空局面的出現，但從各方已知的資料顯示，那將僅限於印度洋廣大的水面而已，對於宣揚「人民戰爭」的共匪，似乎難以產生實際上的阻礙力。亞洲另一具有潛在力量而能與共匪相互抗衡者，乃是日本。由種種跡象顯示，在未來的年月內，他很可能有「分担」美國目前在亞洲此一地區沉重的「負擔」的可能。但事實上，在可見的短期內，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活動必定仍以經濟事項為重心。由以上綜合觀之，如果西方國家缺乏積極有效的對策，東南亞地區可能出現的防衛力的空虛狀況，自將給與野心勃勃的共匪以可乘之機。而緬甸必定首當其衝。

## 十

任何一個政權或國家在其對外關係上，特別是與自己領土相連的鄰邦的關係上，第一個考慮到的，必然是對方可能給自己的安全帶來的危害問題，共匪與緬甸的交往自不例外。緬甸對於共匪的龐大壓力以及對緬甸國內各種反叛組織的煽動、支援，自始即深具戒心。反之，共匪對緬甸亦有某種顧忌，唯恐此一與雲南地區接壤的弱小國家投向西方陣營，則西方軍事力量的移入必將直接威脅到其整個西南地區的安全。基於這種相互間的畏懼心理，雙方便展開了以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為高潮的第一個「友好」時期。但而後雙方關係的發展，却一直像大海的波濤一般起伏不定，出現過以一九六〇年「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和「邊界條約」的簽定為最高峯的蜜月時期，又出現因今年仰光暴動而瀕臨破裂的空前低潮。其基本因素不外下述三點：

(一)雙方關係建立之基礎，乃是一種相互間的畏懼和猜忌的心理，而非坦誠的信賴。這種不自然不健康的基礎便決定了雙方關係不可能平穩地向前

發展。

(二)由於根本上雙方對外野心的不同，其關係發展的方向也已先天註定。對緬甸來說，其最大野心不過求得本身的自主與獨立以及國內各方的正常發展；但共匪除了此項共同的需求之外，更一再表白其對推動「世界革命」的「國際義務」，具有堅定不移的志趣和信念。

(三)雙方實力懸殊過度。因之，前述的那種彼此間的畏懼心理，即或如何強烈，又何能產生有效的抗衡作用？

因之，雙方的「友誼」只能有共同需要的起點，却難以有順利的發展，自更不可能出現緬甸所渴望的結果。這乃是匪緬關係的特質；並非矛與盾的衝突，而是大魚和小魚的難以「和平共處」！

十八年來共匪對緬甸的一貫策略，乃是兩條路線的分頭並進。第一條路線，即保持與緬甸政府之間的正式活動與交往。此一路線作用有二：其一，防範緬甸的傾向於共匪敵對的國家或集團；其二，掩護其第二條路線的順利推展。此一第二路線，即對於緬甸國內各種反叛勢力特別是緬共的積力扶植與支援。其目的，也就是共匪整個對緬活動的最終目的，乃是建立共黨政權。因之，隨着時間的前進，共匪對後一路線之加緊推動乃是必然的，而今年六月仰光的暴動事件，只不過給了共匪一個藉口，而將其預定的計劃提早正式公開而已，豈又能算是針對此一事件的一報復「行動」！

註十：見新華社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電訊。註十一：同註六，四一七—四一八頁。註十二：見一九六〇年三月廿五日之「人民日報」。（周恩來在歡迎尼溫抵北平的宴會上的講話）。註十三：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之「人民日報」社論。註十四：參見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人民日報」發佈之「緬甸友好互不侵犯條約」條文。註十五：美聯社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寮國永珍電訊。註十六：見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紐約時報」之社論。註十七：見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徵信新聞」。註十八：見「僑務政策文集」，一九五七年北平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一頁。（周恩來對緬甸華僑的講話）。註十九：見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註二十：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人民日報」社論「印度的春雷」——聲稱印度共黨之「革命派」已於大吉嶺地區正式建立農民武裝赤區，展開武裝鬥爭。註廿一：參見「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7, 1967, Pp.2—54。註廿二：美聯社及路透社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倫敦電訊。註廿三：馬來西亞總理拉曼今年八月四日自英國返回吉隆坡，對記者談到英國將撤退其駐東南亞地區軍事力量的計劃時，竟令人震驚地宣稱：「倘若遇到一個似中共的政權對馬來西亞進攻，我的政府寧願投降而不願一戰，因為那好過把馬來西亞變成戰場，生靈塗炭一切毀滅」。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合衆社吉隆坡電訊。